

汪德迈的中国学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方法

李正荣

摘要：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文明之世界，如何理解对方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汪德迈不赞成西方世界以自身的“精神”作为唯一“理性”判断中国。他跨越西东文化的谷壑研究中国学，指出中国文化的优越点可供东西方共享。他的观点和方法论在其《新汉文化圈》一书中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

关键词：汪德迈 中国学 汉文化圈 跨文化学方法论

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文明之世界，如何理解对方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问题，理解过程中采取的途径、方法和态度自然决定着理解的结果。跨越文化的谷壑，临在他者文化的世界与仅凭遥望、臆断他者世界所获的认识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本文重点使用汪德迈《新汉文化圈》一书^①，探讨汪德迈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和汉文化圈的跨文化学方法。

一、“各种文化”与单一文化

《新汉文化圈》法文版于1986年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即，中国文化书院群贤将此书中文版纳入由北京大学季羨林、周一良、庞朴诸先生主编的“东方文化丛书”出版计划，时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的汤一介教授为此书撰写了《后记》和《再版序言》。2022年10月，

^①〔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该书法文版为：Léon Vandermeersch, *Le nouveau monde sinis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新汉文化圈》中文版的新版，在译文、注释、报刊文献目录和附录等方面，都做了新的修订与补充，同时增编《附录》，内容包括季羨林先生等“东方文化丛书”《总序》，与汤一介教授撰写的《后记》和《再版序言》。将此书在中国的出版历程清晰地、历史性地展示给读者。

《新汉文化圈》体现了汪德迈先生长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成就，展现他对中国与亚太、中西世界的“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他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强调“各种文化”，而不是单一文化。

二、“伦理”与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开拓了世界文化理论方向的大学者，他站在西方宗教伦理的一端，综判世界各方文化，以一种“遥望”的方式、“推想”的方法、“信仰”的立场对东西方文化体系进行观察。这样的观察使其看到“体系性”的“西方有而东方无”的现象，进而得出宗教伦理社会学的结论：新教伦理是西方独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原因。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和方法，在西方影响很大。1986年，“走向未来丛书”将此书翻译成汉语出版，时值中国思想界“补课”年代，因此，马克斯·韦伯的书也成了启发中国人理解中国自身的经典，影响至今。然而，巧合的是，也正是1986年，汪德迈首次出版法文版的《新汉文化圈》。汪先生经研究发现，“差异”恰恰是和西方世界“新教伦理”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传统：“许多人对于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源于新教伦理原则的著名分析提出诘难，从传统的影响上找原因。”^①看似顺便提到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基本观点，但是，事实上，这个简短的话语是对马克斯·韦伯著名理论的质疑。我们特别关注汪德迈先生在行文中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228页。

极其随意的，不带“理论色彩”的论说铺垫：“只要你经常往来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你就会发现……”这句朴素的充分条件句正对照着不懂汉语，“不出门”到中国，不“弥远”而出行到汉文化世界的韦伯。其实，韦伯本人也自省到隔着东西文化的谷壑而遥望中国社会很可能是一种臆断。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韦伯继续沿着“中国为何没有发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问题方向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源于新教伦理原则”的著名分析，为了说明自己的分析是建立在厚实的理据基础之上，韦伯在书中一开始就安插一个长篇注释，列出一份德、英、法等西语翻译的中国文献的长长的书单，从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到传达皇帝谕令的《京报》，十分庞大。所以，韦伯的态度是极为认真勤勉的，与中国问题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文献都有大量征引。饶是如此，韦伯还是不安地说：“诸多文献资料与碑铭，被翻译过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对于一个非汉学家而言，真是个大障碍。遗憾的是，没有一位汉学专家能帮助我检查此书。因此，笔者满怀顾虑之心，以最为保留的态度将本书交付印行。”^①

相比之下，汪先生是满足了“汉学家”的条件的，同时，又满足了“经常往来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充分条件”，即我们前文所言的研究“各种文化”，他为此多次跨越，提出新见，这是汪先生“跨文化学”的根本方法。

三、“王道”与黑格尔

与汪德迈先生的多次跨越、多次临在的“各文化”相对照的另一组西方学者，由于受时代和语言等因素的局限而不得不在中西文化谷壑的一侧遥望，其中就有大学者黑格尔。汪德迈认为，“中国传统一直将国家机构同哲人思辨中的宇宙运行结构的各个部分相提并论”，因

^①〔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页。

此，“既然上天是一统的，国家的君王就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既然天主宰着宇宙的一切，君王的权力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①由此产生相应的专制政体：“古代中国的帝王制度即是由君主一人主宰国政的专制政体。”^②但是，建立在“宇宙运行”原则之上统治学说“比西方的君权神授理论精妙得多”^③。汪德迈这样的评断，是有两卷大部头著作《王道》做依据的。

《王道》的法文原文标题是“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王道或君王之道）”，如此用连词“或（ou）”的句法来“命题”的方式，既是西方汉学著述的传统，也显示了汪先生跨文化双语思维的习惯和有意识“临在”汉语文化之中的修辞。《王道》是汪先生的学位论文，其总课题是针对“古代中国制度的精神”（*recherches sur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rchaïque*）的研究，其中“精神”（*esprit*）一词，恰好对应了马克斯·韦伯的“精神”（*geist*）^④。《王道》第一部分：中国的“文化结构和家庭结构”（*Structures culturelles et structures familiales*）研究于1977年出版。《王道》第二部分：中国“政治结构、仪式”（*Structures politiques, les rites*）研究于1980年出版^⑤。也就是说，在1986年出版《新汉文化圈》之前，汪先生对中国以及中国化的世界早有专业的、深入的、具体细微的、脚踏实地的，并且是贯通古今的研究。因此，汪德迈可以尖锐地看到西方学者在观察讨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时的方法论缺憾。

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中写道：针对“中国的帝王制度”，“西方作者将此看作专制主义图式，古代中华帝国于是在西方被认为是专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271—272页。

② 同上书，第272页。

③ 同上书，第271页。

④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法语译本多采用“*L'Éthique protestante et l'esprit du capitalisme*”的译名。

⑤ Léon Vandermeersch, *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 : recherches sur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rchaïque. Tome 1, Structures culturelles et structures familiales ; Tome 2, Structures politiques, les rites*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1977; 1980).

制主义的化身”^①。但这些已经成为“先入为主”的观念之后，由于西方自身不同时代的物质生活状况，西方人对中国的帝王制度的听闻、想象和立场也发生着“否定之否定”的变化。首先，“18世纪，传教士将中国同其亲身感受的欧洲相比较，认为中国专制主义运行良好。由于传教士的影响，中国政治制度于是又受到广泛青睐，被认为是一种完善的开明的专制制度”^②。启蒙主义以及启蒙运动之前数个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描述，显然也是建立在遥望和臆断之上，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到法国的伏尔泰，提起中国皇帝治下的东方大国都是理想的世界。但是，18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和美洲发生巨变，所谓资本主义制造出的财富证明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对经济突飞猛进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伴随而来的是西方政治理论的新构建，在“孟德斯鸠创立三权分立理论，阐明了法治国家的机制”之后，西方“遥望”者对中国政治体制的“遥望”态度发生转变，于是，“中国专制主义摇身一变又成为最为恶劣的原始野蛮的暴政的样板”！^③观念先行的遥望，让黑格尔也十分武断：“黑格尔曾经有一段勾勒出中国专制政体特征的话至今仍然继续滋润着那些先入为主之见。”^④汪德迈先生的《新汉文化圈》是一本“预言”性的著作，行文简明扼要，全书很少引经据典，但是，在提及黑格尔“滋润”对中国政体的“先入为主之见”的时候，汪德迈逐字逐句引用了黑格尔的原话：“专制帝王君临中国大地，操纵组织严密的政府和等级森严的国家，甚至宗教和家庭事务都由国家法律所规定，个人在精神上无个性可言。”^⑤黑格尔足不出欧洲，通过各种渠道的间接信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27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汪德迈引自黑格尔《历史理性》(*La raison dans l'histoire*)，法文版，1979年，第284页。详见[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273页。重点看注释1，这段话的法文原文是“En chine règne un despote qui dirige à travers une multitude d'échelons hiérarchiques un gouvernement systématiquement organisé.même les affaires religieuses et familiales sont déterminées par des lois d'état: l'individu est moralement dépourvu de personnalité propre.” [引自G. W. F. Hegel, *La Raison dans l'histoire*, Traduction par Kostas Papaioannou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汪德迈根据1979年版本所引的那段话。此外还有1955版和1965版，汪德迈使用的1979年版可能是此前译本的再版。

息，以自己制定的标尺来衡量观念形态中的中国帝国，因此，在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中，“中国的政治制度显露出‘历史的童年’时代的特点”因为，“那时，法制国家尚不存在，国家如同一家之父一样依照道德以奖惩来直接实行统治。由于无力将社会关系加以法律概念化，中国政治制度将永远处于幼稚时代。”^①以上引文是汪德迈对黑格尔著名观点的概括性复述，黑格尔认定中国处于“历史童年期”“历史幼年期”，认定中国还没有进入“理性的历史”，也就是说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国还没有进化到文明的历史阶段。黑格尔关于中国历史，关于中国政治的论断，他的论断背后的“历史理性”“历史哲学”是世界史学界、政治界的一段公案，至今争论不休。马克思·韦伯从唯利（资本）是图的资本主义中发现“理性资本主义”，从而认定中国缺失“理性的资本主义”，其中的“理性”是否就是延续了黑格尔的“理性”？而西方隔着谷壑遥望中国者，是不是也都认可这种理性？汪德迈先生写道：“这一观点为各种关于中国无历史，中国无发展，中国的王朝更迭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等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②

汪德迈先生走的是另外一条认知路线，他不尊奉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性”去“先入为主”遥望，而是多次跨越，多次临在中国化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研究员，还是作为教师”，他的“学术生涯是一半在东亚，一半在法国度过的”，因为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事实，因为充分研究过甲骨文，研究过法家，研究过中国礼治制度在古代卓有成效的运行，汪先生“摒弃以往套用西方概念研究中国和分门别类地做中国学问的局限，摒弃偏见，一切从中国资料实际出发，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系统关联性，开展整体研究”。^③从而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复数文化”客观真实。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273页。

② 同上。

③ 董晓萍、[法]金丝燕：“出版说明”，[法]汪德迈：《汪德迈全集》第1册，第3页。

汪德迈先生研究汉文化圈，摒弃偏见，因此，能在当代东亚经济发展中，发现并质疑以往经济学家“毫无道理”的统计分类与组合^①。能够看到“先入为主”者看不到的“汉文化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步现象”，提出了“汉文化各国和地区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动力机制可以使这一古老的汉文化圈获得复兴呢？”^②的重大问题，同时对流行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实现现代化是否一定要全盘西化以至于在几十年的短时间内洗刷掉两千年来的历史传统呢？”^③

《新汉文化圈》撰写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亚洲各新工业国何时赶上日本，中国何时成为一个强国”还是一个“十分遥远”的问题^④，但是，汪德迈先生在现实的观察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今日依然富有生命力，切身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存在方面”^⑤显示出强大的功能。同时，汪先生从切身的观察中，实实在在感受到，时值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优势将由保持了近500年之久的西太平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汪先生非常自然地认识到世界文化的“复数”性质，认识到人类的文明的“复数”性质：“不管怎样，西方不久就应该意识到，文化一词不仅在人类的语言中，而且在其他学科中也是复数的。”^⑦

汪德迈面对黑格尔的“历史理性”，面对被这种“理性”所滋润的“先入为主之见”，他的文笔不禁激越：“这类关于中国的看法——如果算是看法的话——是基于西方对所有非西方事物的一种傲慢的盲症。当然，人们可以或者赞赏礼治主义或者赞赏法制主义，但都无权无视礼治主义，一个色盲可以认为交通信号系统十分荒谬，因为它总是绿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6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6页。

⑤ [法]汪德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法]金丝燕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

⑥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7页。

⑦ 同上书，第319页。

色的，但我们却无权像色盲一样来谈论中国。”^①

汪德迈先生的文笔也是如此生动激越！

让我们更为惊讶的是，此处的“色盲”之论，并非是汪德迈先生激越情感所触发的修辞手法，并非是汪先生信手拈来的比喻，汪先生此处“色盲”之论是针对黑格尔在提倡历史理性时所明确主张的“去色彩”的历史观和世界观。黑格尔讲述“历史哲学”课程的“导论”中，在阐述课程“总体概念”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认识到它实质必须是我们的目标；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带着理性的意识，不是用肉体的眼睛，不是用有限的头脑，而是用观念的眼睛，理性的眼睛，去努力穿透表面，穿透相互差异的、多彩的、纷乱众多的事件。”^②

黑格尔的最高追求是“穿透”多彩的、繁复的世界历史现象，去认识世界历史的“实质”，黑格尔高扬的武器是“理性”，是“观念”，这难道不正是汪德迈先生所批判的“先入为主”方法论吗？而黑格尔号召人们使用的那只“穿透”的世界的“差异的多彩（*Mannigfaltigkeit des bunten*）”眼睛是否就是汪德迈先生所贬斥的患有“傲慢的盲症”的眼睛？汪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个盲症是色盲症，而且是看不到交通信号灯中最主要的颜色——红色的色盲。即使不过度阐释此处的无视“红色”寓意，单从色盲的比喻来看，汪先生也明显是与黑格尔的“穿透有差异的多彩”的世界历史观相抗辩。

如此说来，在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汪德迈先生与韦伯、与黑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273页。

② 此段引文的德文原文为：“Dieses Substanzielle zu erkennen, muß unser Zweck sein; und das zu erkennen muß man das Bewußtsein der Vernunft mitbringen, keine physischen Augen, keinen endlichen Verstand, sondern das Auge des Begriffs, der Vernunft, das die Oberflädle durchdringt und sich durch die Mannigfaltigkeit des bunten Gewühls der Begebenheiten hindurchringt.”（见：G. W. F. Hegel, *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Herausgegeben von Johannes Hoffmeister). 1990年版，第32页）后一部分对应的法文是“il ne faut pas voir avec les yeux naturels ni penser avec l'entendement fini : il faut regarder avec l'œil du Concept, de la Raison, qui pénètre la superficie des choses et transperce l'apparence bariolée des événements”（见G. W. F. Hegel, *La Raison dans l'histoire*, traduction par Kostas Papaioannou. Paris: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 1955, 1965. p.51.）

格尔的论战意识是明显的，而且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汪先生既是一个语文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所以，他的抗辩不仅仅是观点的交锋，更有方法论的辩论。而且在他的行文之中，汪德迈先生不是自造一个隐喻去驳斥对方的抽象推理，他与他所抗辩者的文本之间是一种多层次的“对辩”：词语对词语，修辞对修辞，隐喻对隐喻，概念对概念，哲学对哲学。

汪德迈先生多次跨越西东方文化谷壑，谈到“异托邦”^①，因此，他能在世界历史中看到多彩的中国历史，在哲学理性上，看到汉语文字所负载、所保存的中国理性^②。从文字到抽象哲理，汪德迈先生既用天然的肉体的“眼睛”（les yeux naturels/ physischen Augen）看，也用观念之眼，理性之眼（l'œil du Concept, de la Raison/ Auge des Begriffs, der Vernunft），因此，汪德迈先生看到的是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黑格尔关于理性之眼的阐述，也是用了十分形象化的语言修辞，而且，在文本中，他讲天然的肉体之“眼”用复数，讲理性之“眼”用单数，他的研究“归于单一理性”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这就是汪先生所指的“盲症”吧。两人的差异就在于，汪德迈讲“各种”，黑格尔讲“单一”。

2011年12月17日和12月19日，乐黛云先生以《跨文化对话》主编的身份主持了汪德迈和汤一介两位先生的对话。在这场对话的参与者和翻译者金丝燕教授整理的对话文稿中，留下了一段有意义的对话。乐黛云先生说：“我觉得汪德迈教授比较强调差异。如果没有差异，就没有比较，也没有沟通。”汪德迈先生回应道：“对，我强调差异，当然我觉得也有共通之处。”^③

① [法]汪德迈：《跨文化中国学》（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196—212页。

② [法]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法]金丝燕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196—212页。

③ [法]汪德迈、汤一介：《中西文化的互补性》，[法]汪德迈：《跨文化中国学》（上），2020年，第106页。

四、汉字系统与哲学思辨

汪德迈先生并非是一个能神谕的祭司，他显示的是一种不带偏见的跨文化研究的科学精神。

汪德迈先生在西语和汉语两大语言系统中，探索不同的语言体系和语言符号体系的本质，建立了崭新的跨文化汉语表意哲学。他的学术路径显示了文字符号学和哲学思辨并进的跨文化方法论。汪先生从汉语汉字的学习起步，又返回西方的哲学，再返回东方，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综合考察中辨析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化。他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的评价，他看到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汉文化结构”中都发挥着巨大的、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在全球化，世界又充满着疑惑，汪德迈先生的学术研究目标是高远的，但又是务实的。他亲临中国，面向法国，面向西方，大声说出“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的忠告。

至此，应该赞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汪德迈全集》的魄力了。这套著作显示了一个法国大智者跨越东西文化谷壑的勇气、勤奋、坚定、行动，以及这种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所获得的巨大成果。

自2015年起，汪德迈先生每年一度来到北京，为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生国际课程班”授课。我由于参与课程班教学的原因，于2016年初识汪德迈先生，此后的2017年、2018年和2019年，都曾多次近距离地聆听汪德迈先生的跨文化讲学。2020年、2021年，尽管新冠疫情阻隔，汪德迈先生依然通过远程网络课堂，与中国和国际跨文化学者一起建设和探索跨文化的中国学。他从青年，到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中国学。

中国古代的智者列子借孔子之口，说西方之人有圣者。至于这位让世界“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圣者到底是何方神圣，恐怕不可考。但是，法国学者汪德迈先生跨越东西谷壑的行动，

很容易让人想到双翼“一鼓一舞”“腾覆以回转，霞廓而雾散”的大鹏鸟，在长达70年的汉学研究中，汪先生像大鹏鸟一样振翼，振翼向东东复东。同时，汪德迈先生还结伴一大队中国学者，这些学者很像李白《大鹏赋》中的“稀有鸟”。于是李白歌赋中的场面“复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中国世界迅速崛起，与此相向而现的是：西方的大鹏和中国稀有鸟一起作跨文化的逍遥游。